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西域”认知[①]

刘志平

内容提要：在《焦氏易林》成书的时代，“西域”概念开始被汉代人提出，西域开始进入汉代人的视野。汉朝在与西域诸国的频繁接触中，对西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带有浓厚民间文化色彩的《焦氏易林》也有对“西域”的丰富认知。《焦氏易林》对“安息”“康居”“大宛”“乌孙”的相关记载，展现的是汉代人有关西域的政治地理与民族地理认知，体现了汉代人以“西域”为参照对象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对“昆仑”“玉山”“玉泉”“玉门”“玉关”与“西王母”的相关记载，展现的是汉代人有关“西域”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认知。这种认知不局限于科学知识层面，更多是在深层文化价值信仰结构层面对“西域”的一种体认。

关键词：《焦氏易林》　汉代人　西域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9）04—0041—13

DOI：10. 16363/j. cnki. xyyj. 2019. 04. 005

《焦氏易林》是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易学典籍，[②] 是“象数易留传后世的少数著作之一”，[③]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与汉代“西域”相关的信息，就值得我们关注。细致分析这些信息，有助于推进对汉代边疆、民族、地理观念和文化观念的认识。

一、《焦氏易林》成书时代汉朝与西域的关系

《焦氏易林》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这一时期正是“西域”概念（包含“广义西域”和“狭义西域”）被正式提出及西域诸国进入汉代人认知世界的时期，也是西域诸国被置于汉朝管辖之下而与汉朝（含新莽）联系日益密切的时期。

“正是自汉武帝时代起，‘西域’这一政治地理语汇或民族地理语汇，最初出现在历史文献中”。[④]

---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汉时期的国家构建、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7ZDA180）、陕西省社科界2019年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东周秦汉关中人口迁移及其当代意义研究”（项目编号：2019Z134）和西北大学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孵化计划”项目“东周秦汉族群称谓与族群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7XNFH0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 关于《焦氏易林》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笔者已进行过相关阐述，详见拙文《〈焦氏易林〉所见西汉农业自然灾害及牛耕和粮食亩产量》，《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11页。

③ 高怀民：《两汉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8页。

④ 王子今：《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具体说来，最早出自司马相如之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有元光五年（前 130）[①] 司马相如告巴蜀民檄“陛下即位……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②] 对于“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虽如言“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一样可能有夸饰的成分，[③] 但司马相如的脑海里已有“西域”的概念是可以确定的，而且是“康居”所属的广义的“西域”概念。

自张骞首次西使返汉后，整个汉武帝时代对“西域”的较大规模经营都是以广义的“西域”为广阔历史舞台。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数问骞大夏之属”，然后“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张骞到了乌孙后，又“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而在张骞死后，汉武帝“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另外，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因“昆明复为寇”而未成功开通的“南道”，与成功开通的由酒泉西出的“北道”一样，都是为了“抵大夏”。令汉武帝“大悦”的除了“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随汉使献见天子”外，还有“宛西小国驩潜、大益”也“随汉使献见天子”。汉武帝在太初年间远征大宛后，“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就是为了“给使外国者”。[④]

在汉昭帝时代，“西域”似也多指广义的“西域”，“广义西域”中的“狭义西域”也并未得到专门强调。如汉昭帝元凤年间，傅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因诏令责楼兰、龟兹国”。[⑤] 傅介子除了到“楼兰、龟兹国”，还到“大宛”，足见昭帝时的“西域”仍指广义的“西域”。[⑥] 此外，《盐铁论·西域》载录有“大夫”与“文学”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 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的讨论，其中“大夫”言及“西域”时，特别对应提到的是“大宛”“康居”和“乌孙”，而“文学”所作的回应性发言中，也特别提到“大宛”和“安息”，虽然皆为言武帝时事，但也反映了参加盐铁会议的“大夫”与“文学”的“西域”观念。[⑦]

狭义的“西域”似乎是因汉宣帝时“西域都护”的设置而得到特别强调。[⑧]《汉书·百官公

---

① 此处系采纳余太山的意见。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11 页。

②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82 年，第 3044 页。

③ 对于这种夸饰，清人王先谦曾指出过，不过他又说道“或其时偶有通贡之事，《史》无明文耶?”参见〔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考证”引王先谦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3963 页。

④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 3168 ~ 3179 页。

⑤ 《汉书》卷七〇《傅介子传》，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001 页。

⑥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 3872 页。可见，大宛在葱岭西，不属“狭义西域”范围。周振鹤等也认为“大宛”不属汉人所言“狭义西域”范围。参见周振鹤等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93 页。

⑦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499 ~ 501 页。

⑧ 虽然关于“西域都护”的具体建置年代历来颇有争议，但其建置时间不脱汉宣帝时是明确的。或许我们可取余太山这样的解释“西域都护建号于地节二年，立府施政则始自神爵三年，或者说，神爵三年始有名副其实的西域都护。”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第 327 页。

卿表上》：“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①] 对于西域都护所护“西域三十六国”，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余太山采纳日本学者伊濑仙太郎的意见，认为“所谓‘三十六国’不过是‘西域诸国’的同义词，不能指实”。[②] 而周振鹤等认为这“三十六国”是实指，且考证出其具体名目。[③] 我们认可周振鹤等人的意见。汉人的“狭义西域”概念即自此时始得专门强调。[④] 虽然如此，但广义的“西域”概念一直贯穿两汉始终，《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在强调“狭义西域”的同时，实际所载的“西域”范围却远远超过了“狭义西域”，就是很好的说明。

“西汉与西域之关系，一般认为始于张骞首次西使。”[⑤]“张骞通过艰苦的西域探险，掌握了有关‘西极’之地的新鲜知识，充实了西汉人的世界观”。[⑥] 张骞第一次西使亲自到达的西方远国是大宛、大月氏、大夏和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⑦] 其中，大月氏是汉代人早有所闻的，康居似乎也较早为汉代人所了解，[⑧] 而大宛和大夏则是汉代人第一次接触。余太山曾有这样的分析“张骞是最早到达大宛的西汉使者。此前，西汉对大宛似乎一无所知，故同传称，‘大宛之迹，见自张骞’。但大宛对西汉却显然有所了解，知汉‘饶财’，因而相信张骞关于赂遗财物的许诺，并为发导绎。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⑨] 看来，张骞“凿空”之前，中原华夏已对西域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大宛闻汉之饶财”，[⑩] 信息的来源很可能是康居，因为“康居于西域诸国中率先‘朝’汉，很可能与康居当时领有索格底亚那有关。索格底亚那人长于经商，足迹遍于天下，元光初来朝者，或者竟是臣属康居的索格底亚那人亦未可知”。[⑪]

自张骞首次西使返汉后，西域诸国与西汉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西域诸国逐步被西汉控制、西汉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西汉在西域的统治渐趋瓦解这三个阶段。[⑫] 其中第三阶段都护但钦被杀，其实是王莽时期，正所谓“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匈奴大击北边，而西域亦瓦解。焉

①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38页。
② 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第337页。
③ 参见周振鹤等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上）》，第493～495页。
④ 《汉书·郑吉传》有载“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颜师古注“中西域者，言最处诸国之中，近远均也。”《汉书》，第3006页。《汉书·西域传上》亦载“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汉书》，第3874页。在三十六国中，“北道”最西边的“捐毒国”“东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汉书》，第3897页），与上所述西域都护治所乌垒城去阳关的距离“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很接近，恰好说明西域都护治所“于西域为中”并非虚言，也说明此“西域”为狭义的“西域”。
⑤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第7页。
⑥ 王子今《“隔绝羌胡”与“通货羌胡”：丝绸之路河西段的民族关系》，《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3页。
⑦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60页。
⑧ 如前述元光五年（前130），司马相如就说到康居。
⑨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第7～8页。
⑩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58页。
⑪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第84页注释[11]。
⑫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第81～83页。

耆国近匈奴，先叛，杀都护但钦，莽不能讨”。到王莽死后，“西域因绝”，[①]“并复役属匈奴”。[②]

而东汉“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元嘉二年，长史王敬为于窴所没。永兴元年，车师后王复反攻屯营。虽有降首，曾莫惩革，自此浸以疏慢矣”。[③] 余太山指出“西域长史王敬被杀，可以认为是东汉对西域的统治趋于崩溃的标志。”[④]

总之，在《焦氏易林》成书的时代，“西域”概念开始被汉代人提出，西域开始进入汉代人的视野。汉朝在与西域诸国的频繁接触中，对西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有关西域的知识积累达到了相当丰富的程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了这样的历史文化现象：有关西域的政治地理、民族地理、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认知逐步扩展到汉代较广阔的社会层面。作为一部“体现在汉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相交接的特质”[⑤] 的文化典籍，《焦氏易林》对“西域”的丰富认知就是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显著呈现。

二、《焦氏易林》所载“安息”“康居”“大宛”与“乌孙”

《焦氏易林》多有与“安息”“康居”“大宛”“乌孙”相关的林辞：

《蒙·屯》：“安息康居，异国穹庐。非吾习俗，使我心忧。”（《焦氏易林》卷一）[⑥]

《谦·比》：“安息康居，异国穹庐。非吾邦域，使伯忧戚。”（《焦氏易林》卷一）

《涣·师》：“安息康居，异国穹庐。非吾习俗，使伯忧惑。”（《焦氏易林》卷四）

《豫·需》：“毡裘羶国，文礼不饬。跨马控弦，伐我都邑。”（《焦氏易林》卷一）

《震·丰》：“旃裘羶国，文礼不饰。跨马控弦，伐我都邑。”（《焦氏易林》卷四）

《讼·恒》：“区脱康居，慕仁入朝。”（《焦氏易林》卷一）

《屯·屯》：“兵征大宛。”（《焦氏易林》卷一）[⑦]

《噬嗑·萃》：“乌孙氏女，深目黑丑。嗜欲不同，过时无偶。”（《焦氏易林》卷二）

《革·鼎》：“乌孙氏女，深目黑丑。嗜欲不同，过时无耦。”（《焦氏易林》卷四）

所谓“旃裘羶国，文礼不饰，跨马控弦”和“异国穹庐”，是指西汉时匈奴、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等周边游牧民族国家的习俗特征，这与《史记》和《汉书》中的记载一致。《史记·

---

①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 3927 页。
②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909 页。
③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 2912 页。
④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第 135 页。
⑤ 王子今《秦汉社会意识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 255 页。
⑥ 关于《焦氏易林》的版本及笔者所引《焦氏易林》林辞的来源，笔者亦已进行过相关阐述，亦见拙文《〈焦氏易林〉所见西汉农业自然灾害及牛耕和粮食亩产量》，《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 5 期，第 12 页。
⑦ 《焦氏易林》卷一《需·履》、卷四《鼎·无妄》同。

匈奴列传》记载“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① 又载汉朝使者之言“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② 而《汉书·西域传下》载有汉武帝时远嫁乌孙的公主所作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③ 更生动地展现了西域游牧民族不同于汉人的生活习性。《史记·大宛列传》对诸游牧民族又有总结性的记载“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④ 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汉代人还用与“控弦”一词表意相同的“引弓”一词来描述周边游牧民族善射的特点，如《史记·匈奴列传》言及匈奴小孩“能骑羊，引弓射鸟鼠”⑤；汉文帝也用“引弓之国”来概括诸游牧民族国家的特点；⑥ 甚至匈奴冒顿单于对此也有相同认识，其说到匈奴统一诸游牧小国的成就时，就是用“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⑦ 来概括的。

所言“区脱康居，慕仁入朝”，也值得我们进行细致分析。《史记》和《汉书》中所言“瓯脱（区脱）”起初是指东胡和匈奴之间的边界地带，⑧ 后来多指汉朝和匈奴之间的边界地带，而匈奴往往在汉匈边界地带设置“瓯脱王”进行管辖。⑨ 林幹还认为“瓯脱就是匈奴语边界的意思”。⑩ 而《焦氏易林》所言“区脱慕仁入朝”，显然是指匈奴区脱王钦慕汉朝仁德而入朝汉廷，这在《史记》和《汉书》中似未见记载，这或许是《焦氏易林》作者在有意宣扬汉朝之仁德。

同样，《焦氏易林》所言“康居慕仁入朝”，也有可能是在有意宣扬汉朝之仁德。如前所述，在汉武帝元光五年，司马相如所言“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就可能有夸饰的虚假成分。就算康居当时真正入朝了汉廷，也不一定就是“慕仁”而来。如前所述，余太山就认为康

---

①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 2879 页。

②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 2900 页。

③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 3903 页。

④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 3161 页。

⑤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 2879 页。

⑥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 2902 页。

⑦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 2896 页。《焦氏易林》说“安息”也是“异国穹庐”，当是误记，因安息“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 3162 页。《汉书·西域传上》也说安息“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而“罽宾地平，温和，有目宿，杂草奇木……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食……市列”；“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 3885、3889 页。

⑧ “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 2889 页。“东胡王愈骄，西侵。与匈奴中间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 3750 页。

⑨ 汉昭帝时，“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匈奴见瓯脱王在汉，恐以为道击之，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 3783 页。又李陵对苏武言“区脱捕得云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汉书》卷五四《苏武传》，第 2465 页。或言“生得瓯脱王”，或言“区脱捕得云中生口”，皆未言及“区脱慕仁入朝”事。

⑩ 林幹《匈奴史》，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59 页。

居于西域诸国中率先“朝”汉，很可能与臣属于康居、长于经商的索格底亚那人有关。亦即认为康居“朝”汉的目的是为了商业利益。而在此后，传世文献似乎少有关于康居入朝汉廷的记载，康居“似乎一直是西汉经营西域的阻力”。① 直到汉成帝时，康居才“遣子侍汉，贡献”，然而“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以致西域都护郭舜多次向皇帝上言，说康居对“汉使”（“都护吏”）甚为无礼，认为康居“遣子入侍”的目的是“欲贾市为好”。② 当然，出土简牍资料多有西汉宣、元、成三朝康居“朝”汉的记载，但“就政治关系而言，康居对汉朝的朝贡与汉朝对康居的赏赐是对等的甚至是超价值的，所以这种朝贡关系实际意义更在经济上。《康居王使者册》中那种斤斤计较的评估就很能说明问题”。③

不过，在宣扬汉朝之仁德的同时，《焦氏易林》又对周边少数民族与汉之间的战争冲突保留了深刻记忆，如多次说到异族“伐我都邑”。而所言“兵征大宛”④ 在汉人脑海里也的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记忆，如此事被写入汉人的天象观念里。《史记·天官书》：“兵征大宛，星茀招摇。”⑤《汉书·天文志》有更详细的记载：“太初中，星孛于招摇。《星传》曰：‘客星守招摇，蛮夷有乱，民死君。’其后汉兵击大宛，斩其王。招摇，远夷之分也。”⑥ 不仅如此，《焦氏易林》作者还明确认为安息和康居是“非吾邦域”“非吾习俗”的“异国”。这是针对西域异国的“中国一体”的国家意识的体现。

《焦氏易林》有关乌孙人形貌特征的记载也值得我们仔细分析。《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⑦《汉书·西域传上》有大体一致的记载：“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⑧ 余太山认为《史记》和《汉书》于此“描述的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安息、条枝、黎轩和身毒八国的情况”，⑨ 不包括乌孙人。又指出：“《汉书·西域传》颜注所谓‘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或许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师古所遇自述族源的‘今之胡人’或者恰好是乌孙之裔，以致师古将当时‘青眼、赤须’的胡人皆指为乌孙种。”⑩ 似乎认为乌孙人可能有“青眼、赤须”的特征。不过他又认为：“‘乌孙’一名既不妨视为 Asii 之对译，结合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地点，乌孙和 Asii 或奄蔡是同源异流关系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果然，则乌孙与《史记·大宛列传》所传宛西之国在体貌特征上也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别。”⑪ 我们认可余太山的最后一种意见。其实所谓“青眼、赤须”与“深眼，多须髯”并不矛盾，我们可将“青眼、赤须”理解为“深眼，多须髯”中的特异形

---

①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第 11 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 3892 ~ 3893 页。
③ 郝树声《简论敦煌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敦煌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58 页。
④ “太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汉书》卷六《武帝纪》，第 199 ~ 202 页。
⑤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 1349 页。
⑥ 《汉书》卷二六《天文志》，第 1306 页。
⑦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 3174 页。
⑧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 3896 页。
⑨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413 页。
⑩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第 415 页。
⑪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第 415 页。

貌，正体现了“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而具下层民俗文化色彩的《焦氏易林》对乌孙女性的描述，更体现了其时汉人对乌孙人的熟悉，也提供了乌孙人具有“深目”特征的新证据。

三、《焦氏易林》中的“昆仑”“玉山”“玉泉”“玉门”与“玉关”

《焦氏易林》又有对“昆仑”“玉山”“玉泉”“玉门”与“玉关”的相关记载，如:

《蛊·晋》:“昆仑源口，流行不止。龙门砥柱，民不安处。”(《焦氏易林》卷二)

《离·益》:“泉起昆仑，东出玉门。流为九河，无有忧患。”(《焦氏易林》卷二)

《比·姤》:“登昆仑，入天门。过糟丘，宿玉泉。”(《焦氏易林》卷一)

《需·既济》:“受福西邻，归饮玉泉。”(《焦氏易林》卷一)[①]

《剥·益》:“昆仑之玉，所求不得。”(《焦氏易林》卷二)

《颐·蛊》:“西历玉山，东入玉门。”(《焦氏易林》卷二)[②]

《损·豫》:“西历玉山，东入玉关。”(《焦氏易林》卷三)

《屯·屯》:“兵征大宛，北出玉关。”(《焦氏易林》卷一)

《需·履》:“兵征大宛，北出玉门。”(《焦氏易林》卷一)[③]

《临·随》:“安乐几筵，未出玉门。”(《焦氏易林》卷二)

《大有·泰》:“禹将为君，北入昆仑……代舜为治，功德昭明。”(《焦氏易林》卷一)

汉代人对西域“昆仑山”及“河源”的认知是丰富多样的。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使者在于窴探寻到黄河的源头，汉武帝于是“案古图书”把黄河源出之山命名为“昆仑”。[④] 汉武帝的这一认知或许来源于张骞的介绍“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 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⑤] 不过司马迁似对此已提出疑问，所谓“《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 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⑥] 班固似也和司马迁一样对此提出了疑问。[⑦] 清人王先谦认为班固赞语“全本《史记·大宛传》赞，不敢斥言武帝志穷荒远之失，举昆仑之非，实以寓讽也。武帝所名昆仑非真河源，然因此并疑昆仑，则蔽所不见之失也。”[⑧] 清人王鸣盛则认为“《大宛》赞只辨昆仑虚妄，余置不论。传中言‘案古图书，名河所出曰昆仑’，而赞则云‘恶睹所谓昆仑’，有味可想。”[⑨] 清人梁玉绳则发出这样的疑

---

① 《焦氏易林》卷一《履·讼》、卷四《既济·乾》同。
② 《焦氏易林》卷四《中孚·鼎》同。
③ 《焦氏易林》卷四《鼎·无妄》同。
④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 3173 页。
⑤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 3160 页。
⑥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第 3179 页。
⑦ 《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赞曰”，第 2705 页。
⑧ 〔清〕王先谦补注;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4322 页。
⑨ 参见〔日〕泷川资言考证; 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考证”引王鸣盛曰，第 4160 页。

问 “史公此言疑河不出昆仑乎？抑疑世无昆仑乎？”① 不管怎样，汉武帝的认知似乎对汉代人产生了较大影响。或许是为了弥补汉武帝对河源认知的缺陷，大多数汉代人接受了源出西域昆仑山的于阗河“东注蒲昌海”后，“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而成为黄河源头的理解。② 班固在质疑的同时，也有“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原出焉”的认识。③ 而具有较浓厚民间文化色彩的《焦氏易林》所言“昆仑源口，流行不止。龙门砥柱，民不安处”和“泉起昆仑，东出玉门。流为九河，无有忧患”，很明显也认可了汉武帝的意见。就是东汉富有批判精神和理性认知的王充也认为“河源出于昆仑，其流播于九河”④。而“博学经籍”⑤ 的许慎在《说文解字》篆文“河”下也明确写道 “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⑥ 东汉后期“博览多闻”⑦ 的应劭，在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为目的而撰作的《风俗通》⑧ 中亦有言 “河出燉煌塞外昆仑山，发源注海。”⑨

从《焦氏易林》可看到，在汉代人的认知里，处于昆仑山的黄河源头又被称为“玉泉”。“玉泉”之名或与昆仑山“多玉石”⑩ 有关，昆仑山也因此又被称为“玉山”。而从“西历玉山”“受福西邻，归饮玉泉”等表述可知，汉代人对西域“昆仑山”西方绝远地理方位的认知是明确的。司马相如在向汉武帝奏上的《大人赋》中也有“西望昆仑”之表达。⑪

《焦氏易林》还将“禹”和“昆仑”联系起来，无疑是西域昆仑山带有神话性的历史人文色彩在汉代的再一次涂抹。大概在春秋战国之际，已形成禹代舜为君之前曾“学于西王国”的认知。《新序·杂事·鲁哀公问子夏章》：“鲁哀公问子夏曰 ‘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 ‘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尝闻也。’哀公曰 ‘然则五帝有师乎？’子夏曰 ‘有……禹学乎西王国……’”⑫《荀子·大略》也有“禹学于西王国”的记载。⑬《白虎通·辟雍》则直接将其称为“国先生”。⑭ 汉代纬书《论语比考》也说到“禹师国先生”。⑮ 有学者认为“或许就是‘西

---

① 〔清〕梁玉绳 《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448 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 3871 页。叶舒宪也指出 “一旦西汉武帝的钦定性命名行为，将昆仑地望从甘青地区拓展到新疆南疆的于阗，这就必然在新旧观念之间催生出明显的矛盾，所有坚持信念的后人只能尽其所能去调和这些矛盾，如班固写《汉书·西域列传》时所做的那样，而不是推翻河出昆仑说本身，否则就等于抹杀了数千年来玉石宗教崇拜说及其新权威观点。换言之，‘河出昆仑’成为华夏神话地理观的第一条教义。在饮水思源的意义上成为所有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居民的共同信念。黄河重源说有效地将青海积石山下的实际黄河与被想象在西域的昆仑山河源串联起来，成为一个庞大水系的整体。”叶舒宪 《河出昆仑神话地理发微》，《民族艺术》2016 年第 6 期，第 26 页。这样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
③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 3881 页。
④ 黄晖撰 《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1990 年，第 216 页。
⑤ 《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许慎》，第 2588 页。
⑥ 〔汉〕许慎撰 〔清〕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516 页上栏。
⑦ 《后汉书》卷四八《应劭列传》，第 1609 页。
⑧ 《后汉书》卷四八《应劭列传》，第 1614 页。
⑨ 王利器校注 《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0 年，第 457 页。
⑩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 3173 页。《剥·益》也提到“昆仑之玉”。
⑪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 3060 页。
⑫ 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 《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9 年，第 641 ~645 页。
⑬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 年，第 489 页。
⑭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 《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 年，第 255 页。
⑮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 《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067 页。

王母’”。[①] 而“西王母”又和“玉山”（“昆仑山”）有联系。[②] 若将此同禹号“戎禹”[③] 及《焦氏易林》“禹将为君，北入昆仑……代舜为治，功德昭明”的内容联系起来，禹向老师学习的地方是在西域昆仑，而这位老师就是西王母，或许是汉代人的一种认知。

《比·姤》所谓“登昆仑，入天门”，表明昆仑山的神性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汉代人的认知世界里。《汉书·礼乐志》所载《郊祀歌·华烨烨》就有“神之旖，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④] 的内容。又《淮南子·原道训》载“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⑤] 汉代纬书《春秋命历序》曰：“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注曰：“昆仑为天之中柱，故曰柱州。”[⑥]“昆仑”的神性借助与“天”和“天皇”的联系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同书又曰：“天体始于北极之野，地形起于昆仑之墟。”宋均注“北极，为天之枢。昆仑，为地之柄。”[⑦]“昆仑”成为“地”之源起，具有同“天”之始源——“北极”一样的神性。就是对时人认为淮南王刘安“得道，举家升天”的观念提出否定意见的王充，居然是这样反驳的“如天之门在西北，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淮南之国，在地东南，如审升天，宜举家先徙昆仑，乃得其阶；如鼓翼邪飞，趋西北之隅，是则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徙之昆仑，亦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虚非实也。”[⑧] 可见，“昆仑”的神性仍然对王充有一定影响。

另外，《焦氏易林》中“西历玉山，东入玉门”“西历玉山，东入玉关”“兵征大宛，北出玉关”“兵征大宛，北出玉门”等内容还涉及到汉代“玉门关”的相关问题。首先，在汉代人的“西域”认知里，“玉门关”和“阳关”一样，是重要的地理界标。王子今在梳理相关文献后即指出“在汉人的政治地理观念中，‘西域’即‘玉门、阳关’以西诸国。”[⑨]《焦氏易林》上述相关表述也是很明确的例证。其次，关于汉代“玉门关”的称名及位置，学界曾有过热烈讨论。[⑩] 其中李并成提及“玉门”名称的来历与“西域向中原贡玉的孔道经由石关峡”及“当地自古亦产玉石”有关。其实，关于“玉门”之名与“玉石”有关，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早已提出过。[⑪] 据说这种意见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李正宇和李树若反驳了

---

① 原注“小村一郎先生说‘或如前人已指出的那样就是西王母本人，或是与它有关系的人物。’《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中文版（孙昌武译），第29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王子今，周苏平《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第120页。

② 详见后文。

③ 汉代纬书《春秋命历序》：“治五十三年而禅于文命，号曰戎禹，凡十有四世，治四百七十三年。”〔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883页。

④《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66页。

⑤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16页。

⑥〔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875页。

⑦〔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885页。

⑧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319页。

⑨ 王子今《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6~7页。

⑩ 参见陈梦家《玉门关与玉门县》，《考古》1965年第9期，第475~476页；赵评春《西汉玉门关、县及其长城建置时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第53~54页；李并成《玉门关历史变迁考》，《石河子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9、11页；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第18页。

⑪〔英〕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64页。

这种意见，提出了不同见解。[①] 叶舒宪又反驳了李正宇和李树若的意见，继续支持斯坦因的意见。[②] 结合《焦氏易林》将“多玉石”的西域昆仑山称为“玉山”，将山上所谓“河源”称为“玉泉”，加上“西历玉山，东入玉门”和“西历玉山，东入玉关”的紧密对应性表述，斯坦因、李并成和叶舒宪等人的意见或许是可取的。从《焦氏易林》还可看到，汉代民间将“玉门关”省称为“玉门”，或省称为“玉关”。

四、《焦氏易林》所见“王母”与“西王母”

“王母”与“西王母”也频频出现在《焦氏易林》中:

《坤·噬嗑》:“稷为尧使，西见王母。拜请百福，赐我善子。”(《焦氏易林》卷一)

《蒙·巽》:“患解忧除，王母相于。与喜俱来，使我安居。”(《焦氏易林》卷一)

《讼·需》:“王母善祷，祸不成灾。”(《焦氏易林》卷一)

《讼·泰》:“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与天相保。”(《焦氏易林》卷一)

《临·临》:“弱水之上，有西王母。生不知老，与天相保。”(《焦氏易林》卷二)

《既济·大畜》:“弱水之右，有西王母。生不知老，与天相保。”(《焦氏易林》卷四)

《讼·家人》:“西过王母，道路夷易，无敢难者。”(《焦氏易林》卷一)

《小畜·大有》:“金牙铁齿，西王母子。无有祸殃，涉道大利。”(《焦氏易林》卷一)

《小畜·丰》:“中田膏黍，以享王母。受福千亿，所求大得。”(《焦氏易林》卷一)

《临·履》:“驾龙骑虎，周遍天下。为神人使，西见王母，不忧危殆。”(《焦氏易林》卷二)

《萃·既济》:“老狐多态，行为蛊怪。惊我王母，终无咎悔。”(《焦氏易林》卷三)

《鼎·萃》:“西逢王母，慈我九子。相对欢喜，王孙万户，家蒙福祉。”(《焦氏易林》卷四)

“西王母是传说中的西方女神。西王母所居之西王母山，一说是玉山，一说是昆仑之丘”。[③] 联系到前所述《焦氏易林》将“昆仑山”称为“玉山”的情形，可知在《焦氏易林》作者的认知里，西王母所居就是汉武帝命名的“昆仑山”,[④] 与西王母有关的“弱水”就是西域昆仑之弱水。当然，“所谓‘西王母所居处’的考定，是十分复杂的工作。”[⑤] 即使这样，仍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

首先，“这样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即‘自后世上溯有关西王母的最古老的资料，可见于

① 李正宇，李树若《玉门关名义新探——金关、玉门二名互匹说》，《敦煌学辑刊》2005 年第 1 期，第 123、126 页。

② 叶舒宪《玉门、玉门关名义再思考——第十二次玉帛之路考察札记》，《民族艺术》2018 年第 2 期，第 36 页。

③ 王子今《上古人的世界观——读〈山海经的文化寻踪〉》，《博览群书》2004 年第 12 期，第 57 页。

④ 汉代人又将其称为“南山”，所谓“于阗在南山下”。《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 3871 页。而“昆仑”之名的来历可能与匈奴有关，详见后文。

⑤ 王子今，周苏平《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120 页。

战国时代的文献。’”① 王子今和周苏平引述了《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荀子》《尔雅》的相关材料。② 此外，可以补充的材料有《庄子·大宗师》中的相关记载。③ 从中我们可看到，“西王母”是与“豨韦氏”“伏戏氏”“堪坏”“冯夷”“肩吾”“黄帝”“颛顼”“禺强”“彭祖”“傅说”诸神并列的，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西王母”有联系的是“少广”，而不是“昆仑”，是“堪坏”和“昆仑”有联系。当然，《山海经》和《竹书纪年》已将“西王母”和“昆仑”联系了起来，《山海经》卷一六《大荒西经》还将“昆仑”“西王母”和“弱水”“流沙”建立了联系。④ 值得注意的是，与“西王母”并列的还有“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的“神”，此“神”很可能就是《庄子·大宗师》所说的“堪坏”。此外，《大戴礼记·少间》又将“西王母”和“舜”联系了起来。⑤

其次，到了汉代，“弱水、西王母”传说具有比较复杂的源流。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一次西使返汉后，向汉武帝汇报其所见所闻西方远国之情状，有“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的内容。⑥ 王子今和周苏平即据此认为“以所谓‘代俗’即晋冀北部山区地方民俗不足以正确解释西王母崇拜的生成和影响”。⑦ 亦即认为“《大宛列传》中关于‘西王母’的传说，更明确说其起源非发生于中土，而是‘安息长老传闻’的条支西来神话”。⑧ 而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所遣使者又提供了这样的情况“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⑨ 可见，“西王母”传说的起源地在更远的大秦之西。那怎样理解在汉代之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西王母”的神话传说，而且不仅和“弱水”“流沙”，还和“昆仑”“舜”“禹”“周穆王”等建立了联系呢?

或许是起源于大秦之西的“弱水、西王母”传说在汉代之前已经东传至中原华夏，⑩ 只是中

---

① 原注“〔日〕小村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中文版（孙昌武译），第 24 页，中华书局，1993 年版。”王子今，周苏平《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119 页。

② 王子今，周苏平《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119 ~ 120 页。

③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 年，第 246 ~ 247 页。

④ 《山海经》卷一六《大荒西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16 页。

⑥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 3163 ~ 3164 页。

⑦ 王子今，周苏平《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121 页。

⑧ 王子今，周苏平《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118 页。

⑨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 2920 页。余太山认为《后汉书·西域传》此处关于大秦国的记载摘录自《魏略·西戎传》。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第 30 ~ 31 页。即使这样，此处关于大秦国的相关信息最初亦应来自大秦国使者之相告。

⑩ 王子今已指出“考古工作证明，在张骞之前，中原经过西北地方与外域的文化通路早已发挥着促进文化沟通、文化交流、文化融汇的历史作用。”并具体阐释道“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公元前 5 世纪的贵族墓中曾经出土中国丝织品。巴泽雷克 5 号墓出土有凤凰图案的刺绣和当地独一无二的四轮马车。车辆形制和刺绣风格都表明来自中国。在这一地区公元前 4 世纪至前 3 世纪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有典型关中文化风格的秦式铜镜。许多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表现出所着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有人推测公元前 5 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不过，这些现象当时似乎并没有进入中国古代史学家的视野，因而在中国正史记录中，汉代外交家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事迹被誉为‘凿空’。”王子今《前张骞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史的匈奴时代》，《甘肃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第 10 页。

原华夏将其进行了华夏式改造，赋予了新的华夏内涵，从而和“尧”[①]“舜”“禹”“周穆王”等发生了联系。而和“昆仑”发生联系，可能与匈奴有关。王子今评价叶舒宪等撰著的《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时曾有这样的介绍：“《山海经的文化寻踪》引汤惠生说‘昆仑：祁连：赫连：贺兰’之间有对音关系，都是匈奴语‘天’的意思，都是‘萨满教中的宇宙山’，或联络天地的‘宇宙中心’。”[②] 匈奴又比较早地和汉代所谓的“西域”发生了接触，并在西汉初年对西域诸国有了一定的控制。[③] 当然，关于“昆仑”之语源，学界有多种意见。[④] 不管怎样，最迟到战国时期，起源于大秦之西的“弱水、西王母”传说已和“昆仑”联系了起来。

到了汉代，“弱水、西王母”传说似乎通过张骞的西使考察和汉武帝的认定而得到了官方的强调，这很可能又对早已在中原华夏民间流传的“弱水、西王母”传说产生了更大的推促作用。而在战国时期至西汉初期已经形成的与“尧”“舜”“禹”“周穆王”等发生联系的“弱水、西王母”传说，在汉代仍然多线索并行。如前所述，贾谊将“西王母”和“尧”联系了起来，而到《焦氏易林》的时代，仍有将“西王母”与“尧”关联起来的说法，而且又增加了“稷”，所谓“稷为尧使，西见王母”。此外，如前所述，《焦氏易林》又有将“禹”和“西王母”“昆仑”联系起来的说法。东汉王充在《论衡·无形》中写道：“禹、益见西王母，不言有毛羽。”[⑤] 仍将“禹”和“西王母”放在了一起，还增加了“益”。对于“舜”和“西王母”的联系，《风俗通义》引《尚书大传》曰：“舜之时，西王母来献其白玉琯。”[⑥]《说文解字》也说：“古者管以玉，舜之时，西王母来献其白琯。”[⑦] 汉代纬书《洛书灵准听》也有记载：“舜受终，凤皇仪，黄龙感，朱草生，蓂荚孳，西王母授益地图。”[⑧]“西王母”和“周穆王”的关联也屡被汉代人提及，如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写道：“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⑨]《风俗通义》也承袭这个说法：“赵之先，与秦同祖。其裔孙曰造父，幸于周穆王，为御骅骝、騄耳之乘，西谒西王母。”[⑩]

不管怎样，汉代盛行西王母崇拜是不争的事实。[⑪]《焦氏易林》中的相关记载再次生动展现

---

① “西王母”和“尧”发生联系的较早记载见于贾谊《新书·修政语上》：“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叟。”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 360 页。

② 王子今：《上古人的世界观——读〈山海经的文化寻踪〉》，《博览群书》2004 年第 12 期，第 57 页。

③ 关于匈奴对西域的较早经营，可参看王子今：《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

④ 参见牛汝辰：《昆仑地名与昆仑文化——西域最早的汉语地名考释》，《测绘科学》2016 年第 1 期，第 70 ~ 74 页。

⑤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 67 页。

⑥ 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 284 页。

⑦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 197 页下栏。

⑧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 1256 页。

⑨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 1779 页。有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即《史记》卷四《周本纪》、卷五《秦本纪》说到周穆王时，都未言及西王母，只有《赵世家》说到西王母，此外，晋武帝时出土于汲郡战国魏王墓里的《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都有将周穆王和西王母关联起来的记载。这说明了什么呢？会不会是战国时赵人制造了这个关联，从而又被同出于晋的魏人采纳？

⑩ 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 34 页。

⑪ 参看王子今，周苏平：《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114 ~ 122 页。

了这一文化现象。而这也可看作是汉代人的“西域”认知在深层文化价值信仰结构上的一种体现。

五、结语

《焦氏易林》成书的时代，正是“西域”概念（包含“广义西域”和“狭义西域”）被正式提出及西域诸国进入汉代人认知世界的时期，也是汉朝（含新莽）与西域诸国产生频繁接触的时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带有浓厚民间文化色彩的《焦氏易林》也有对“西域”的丰富认知。

从《焦氏易林》对“安息”“康居”“大宛”“乌孙”的相关记载来看，《焦氏易林》作者眼里的“西域”仍然是广义的“西域”，其对西域诸国的风习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焦氏易林》作者一方面宣扬汉朝对周边异族之仁德，另一方面又极力宣扬针对西域异国的“中国一体”的国家观念，体现了汉代人以“西域”为参照对象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① 而这与《焦氏易林》的儒学理念是分不开的。② 王子今曾指出：“《焦氏易林》成书的时代，正是儒学地位空前上升，逐渐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也是儒学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适应‘大一统’政治的需要而实现‘更化’，逐步走上神学化道路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儒学影响的推广，并不仅仅限于其学术原理受到最高执政集团的尊重，其政策建议为帝王所采纳，而更突出地表现为知识阶层的广泛认同以及通过这一媒介向民间的文化渍染和精神控制。儒学向社会基层的空前规模的渗透，也不仅仅限于简单的研习人士的增多和传布范围的扩大，而更突出地表现为对民俗生活的全面影响，包括对下层社会思想和言行的逐步规范。”③ 这样的论断是精当的。

《焦氏易林》对“昆仑”“玉山”“玉泉”“玉门”“玉关”与“西王母”的相关记载，展现的是汉代人有关“西域”的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认知。这种认知不局限于科学知识层面，更多是在深层文化价值信仰结构层面对“西域”的一种体认，这种体认潜含有重要意义。如对“河出昆仑”的体认，正如叶舒宪所言：“河出昆仑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人文地理信念，如今看来属于神话地理观念，牵涉到中原国家对新疆的文化认同。可以说，其最大文化价值在于，它对中国文化的构成和国家版图的扩大，产生了决定性的观念引导作用。”④ 又如对起源于西域绝远异国的“西王母”传说的华夏式改造在汉代得到进一步强化，体现了汉代人具有怀柔西域远国的政治文化追求。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陈　霞　　责任校对：李文博

---

① 自汉武帝以后，“在整体意义上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汉人’认同产生的同时，‘中国一体’的国家意识也开始凸显”。参见刘志平：《汉代的“汉人”称谓与“汉人”认同》，《人文杂志》2018 年第 12 期，第 104 ~ 105 页。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焦氏易林》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正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

② 儒家推崇仁德与“大一统”。

③ 王子今：《秦汉社会意识研究》，第 262 页。

④ 叶舒宪：《河出昆仑神话地理发微》，《民族艺术》2016 年第 6 期，第 26 页。

From " Self-reliance" to " Self-consciousness" : The route to the National Unity among Xinjiang Ethnics in Modern Times Zhao Haixia, Meng Nan (1)

Abstract: Mutual and closed relations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in Xinjiang have been shaped with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over the thousands of years. The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of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history have enable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Xinjiang to share the same fate and live together, forming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mon destiny.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unity of the nation and opposing foreign aggression, after being through the baptism of blood and fire, all ethnic groups in Xinjiang together with others of entire country have carried out long-term and arduous struggles and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entity from " self-reliance" to " self-consciousness".

Keywords: Modern time; All ethic groups of Xinjiang;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self-consciousness

Additional research on State Mimohe and City of Boxide in Central Asia Xu Xuya (11)

The administration of ruling network in western Pamir during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 – based on the study of Badakeshan asking for help in Qianlong year 33 Ma Zimu (18)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 Hsiory of the Xiongnu" in the " Shiji" (Historical Records) – – On the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 Shiji -Daw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Dawan) Sun Wenbo (28)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since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narrow meaning of " Western Region" refers to the present Xinjiang, west of Yumen and Yangguan Pass. While the broad meaning of " Western Region" includes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However, it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description on Han Shu. The concept of the early " Western Region" in " Shiji" (Historical Records) is related to the Xiongnu. It is even called the " Xiongnu Western Region". The Hexi reg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right part of the Xiongnu does not include the present Xinjiang neither the small city-states in Central Asia. Having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reediting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important events such as the Dayuezhi, the West Wusun and the King of Xiongnu Hunye surrendered to Han. The ordering of " Historical records of Officials" (史记·循吏列传》," Records of Jizheng" (《汲郑列传》) " Records of the Confucian Scholars" (《儒林列传》) " Brutal Officials" 《酷吏列传》) followed the trace of active stage of the bureaucratic groups, revealed the changes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Contacting the West and conquering Dawan were an important management of Emperor Wu in his later years. The " Dawan Biography" was after the section of " Brutal officials", who were the " Emergency Minister", and such activities were regarded as the end of the Emperor Wu' s politics. Although this records involves Zhang Qian and Li Guangli, the whole article is still centered on Dawan, focusing on the big countries such as Daxia, not the small, and using the expressions of " Western States"," Northwest States" and " Northwest Foreign States". So, before the Emperor Wu in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concept of " Western Region" actually corresponded to the Hexi region until the period of Emperor Zhao and Xuan, along with the westwards expansion of Han Dynasty, the concept of the Western Region of the " 36 states" began to appear.

Keywords: Western Region; Historical Records (《史记》); Xiongnu Western region; Records of Dawan (《大宛列传》); Western Foreign States

Viewing the cognition of " Western Region" by Han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 Jiao Shi Yi lin" (《焦氏易林》) Liu Zhiping (41)

Abstract: When the book " Jiao Shi Yi Lin" finished, the concept of " Western Region" began to be proposed by people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n the Western Region began to enter the vis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Han Dynasty. The Han Dynasty ha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Region through its frequent contacts with the Western state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 Jiao Shi Yi Lin", a book with strong folk culture also had a rich understanding of the " Western Region". " Anxi" (安息)," Kangju" (康居)," Dawan" (大宛)," Wusun" (乌孙) recorded in the book " Jiao Shi Yi Lin" showed the well recognition in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national geography of Western Region in the Han Dynasty. It also reflected that people in the Han Dynasty used the " Western Region" as a comparable object suggesting the strong Han Dynas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within the Han Dynasty. The related records of " Kunlun"," Yushan"," Yuquan"," Yumen"," Yuguan" and " Western Queen" indicated the

knowledge of natural geograph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of the "Western Region" among the people of the Han Dynasty. This knowledge is not limited to the science, but more to the profound cultural value and belief on the cogni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
Keywords: "Jiao Shi Yi Lin" (《焦氏易林》); People in Han Dynasty; Western Region

Silk Road and westwards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Plains music

Wang Zijin (54)

Abstract: The Silk Road has facilitate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cluding the music and other artistic forms from different ethnics recorded in ancient writings. Over the past years, researcher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western influence on the societies in Central Plain. In fact, the evidence in the transportation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during Han Dynasty also revealed Han music "Bell and Drum", "Singing and Pipes", "Music" were favored by ethnics in Western Region. Jia Yi proposed a strategic plan that using music and other form of arts to achieve a cultural influence to the people in grassl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as proved that along with the westwards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Plain music through the Silk Road, the music, which should not be over looke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 of Han cultural accomplished its influence to the out side world.
Keywords: Han Culture; Western region; Grassland people; Bell and Drum; Drum and Pipe; Music; Silk Road

The chronology and related issues for the Paleolithic remains found in north Xinjiang

Yi Minjie (64)

Abstract: Abundant quantity of chipped stone tools were found in north Xinjiang. Specifically the stone artefacts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s of making techniques were unearthed from recent archaeological work, including the Mousterian stone tools unearthed from the Tongtiandong site, the blade technological remains collected from the Luotuoshi site, and numerous surface-collected microblade remains. The discovery of these three categories of artefacts has facilitated u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Neanderthal distributed, the cultural complex of Paleolithic in China, the modernity of ancient human behavior, the dispersal of ancient people with blades technology in the Upper Paleolithic, the social structure among the people with micro-blades technologies etc. In considering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lithic techniques model together with the related discovers in neighboring areas, this paper i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lithics found in north Xinjiang,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basic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and to tentatively discuss the migration and adaptive strategies of ancient foragers.
Keywords: North Xinjiang; Mousterian; Blade; Microblade; Paleolithic

Scientific Analysis on the Bronzes unearthed at the Liushugou Cemetery in Hami

SuBei·NaiBi, Wang Yongqiang, Zhangjie, Song Guoding, Luo Wugan (73)

Abstract: In order to trace the alloy technology and quarry origins of the bronzes unearthed from the Liushugou cemetery in Hami, this study, using metallographic analysis method with SEM-EDS, MC-ICP-MS and other techniques to examine 23 bronzes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e Liushugou cemetery.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se bronze samples were casted to shape and the most were Cu-Sn binary alloy, and almost all of these samples contained a small amount of arsenic. The result of lead isotopic analysis revealed the consistent characteristics with some the bronzes from the Tianshanbeilu cemeteries in eastern Xinjiang, also sharing similar Lead isotopic characteristics with many bronzes collected by Yili Museum, and from Nulasai copper mining site in western Xinjiang, which indicates the possibility of sharing the same quarry source for these regions. While, compared with the copper mines both in Xinjiang and Gansu, it is found that the bronzes unearthed from the Liushugou are likely to use copper source from both regions, such as the Nulasai, and the Jimusayi and Tuwu-Yandong copper mine. This suggests that the Liushugou cemete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ianshanbeilu. This research also suggests the bronzes found in the East Tianshan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at in the western Xinjiang. This has provided a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east Tianshan region is likely to be the important passway for the bronz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Xinjiang and the west Gansu which should not be over looked.
Keywords: Eastern Xinjiang; Bronze; Liushugou cemetery; Alloy technology; Lead isotop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Persian remnants of the ancient Mani in the Tuyugou of Turpan and discussion on the religious life of the Manichaeans in Tuyugou based on Manichean scripts

Hu Xiaodan (83)

Abstract: Two pieces of Manichean scripts were found at the ancient Uyghur Buddhist temple site